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转向

白景迪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要

《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其中的哲思活动为其实现自由观的转向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虽然马克思还未对黑格尔展开深入批判, 但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从作为抽象存在的传统路径中逐渐脱离, 转向对德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而就其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联而言, 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理解显然已经表现出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与突破。

关键词

《莱茵报》时期, 自由观, 物质利益, 现实转向

The Realistic Turn in Marx's View of Freedom during the "Rheinische Zeitung" Period

Jingdi Bai

The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2, 2026; accepted: April 12,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The period of "Rheinische Zeitung"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Marx'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philosophical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eriod laid an important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view of freedom. Although Marx had not yet launched an in-depth critique of Hegel, hi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during this period had begun to gradually deviate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abstract existence and turned to the attention of German social reality problems.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liberalism, Marx's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of freedom" has obviously shown reflection and breakthrough on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Keywords

“Rheinische Zeitung” Period, View of Freedom, Material Interests, Realistic Tur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莱茵报》创刊到关停(1842~1843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两个转变”的过渡期。在既有学术讨论中,“《莱茵报》时期”常被视为对青年马克思世界观转变研究的补充,并认可马克思早期思想存在从古典自由主义到转向社会主义的历程,而对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系,学界尚未达成一致。围绕这一争议,形成了“停留论”“断裂论”和“间接批判论”三种代表性观点,即“停留论”拘泥于理论形式的连续性,却忽视了马克思在现实问题分析中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断裂论”虽洞察到马克思对形式自由的批判,却有过渡诠释之嫌;“间接批判论”采取折中立场,但其“间接性”的界定本身较为模糊,反而遮蔽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论特质。鉴于此,本文以“自由问题”为主线,聚焦马克思的“现实转向”——即方法论上从抽象哲学理念转向具体社会现实,主题上从精神自由转向社会自由的条件与限度。并通过呈现物质利益问题的发现过程,对“自由”从抽象走向现实的路径进行分析,指出了马克思思想调整并非预设的必然演进,而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核心预设(理性国家、形式法权)的实质性质疑,其批判亦非“暂时逗留”的附带产物,而是自由观重构的必要环节。由此厘清社会现实在马克思自由观演变中的独特意义,更准确把握《莱茵报》时期的理论特质与历史定位。

2. 《莱茵报》之前马克思思想中的自由问题

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方面是对古希腊以来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自由观的批判继承,另一方面得益于基督教文化中自由意志的觉醒,即宗教自由。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理论视野。

2.1. 古希腊时期的自由问题

自由问题,是西方思想史中的重要议题。在古希腊,自由最初是一种本真的生活状态。但自苏格拉底后,随着城邦衰落,现实自由式微,自由问题开始从现实世界转向精神世界。在中世纪,这种自由构成了“神圣形象”的“上帝本体论”证明。正如黑格尔所言:“单个人独立的本身无限的人格这一原则,即主观自由的原则,以内在的形式在基督教中出现。”^[1]自此,自由问题从现实世界转而进入精神世界,抵达彼岸。

2.2. 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问题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直接理论源泉,对其自由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其中,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的论断,成为青年马克思思考自由问题的核心理论前提。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国家界定为“自觉的伦理实体”,认为其作为普遍理性的最高体现,能够突破市民社会中私人利益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在更高层面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统一。这一将国家神圣化、理性化的观念,深刻塑造了马克思早期对自由实现途径的理解,构成了其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现实困境前

的核心信念。

在黑格尔之前,康德(Kant)认为“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2], p. 135)将自由确立为“纯粹的先验理念”,在实践理性范围内通过意志自律实现道德自由。黑格尔则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与复归的辩证过程,将自由理解为精神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然而,对青年马克思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黑格尔将这一进程最终落脚于理性国家的理论建构。马克思此时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作为普遍理性体现的基本立场,将理性国家视为解决自由与现实矛盾的关键场域,相信通过国家的理性本质可以实现个体自由与普遍利益的统一。

这一理论预设的确立,为马克思后来在《莱茵报》时期的现实观察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参照系。当他面对普鲁士国家的具体运作时,黑格尔所描绘的理性国家理念与现实政治状况之间的巨大落差,将成为推动其思想转变的重要动力。

2.3. 《博士论文》时期的自由问题

马克思首次系统论述自由问题是在其《博士论文》之中。在论文的开篇与结尾,马克思(2002a)都高度赞扬伊壁鸠鲁的自我意识哲学,他借用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来阐释自己的哲学宣言:“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3], p. 12)并称赞伊壁鸠鲁打破了必然性的束缚。对此,黄建都认为“伊壁鸠鲁以新的哲学形态总结了希腊哲学,坚持了人的自由”[4]。马克思把自由视为对既有秩序、必然性的克服与反抗,这无疑带有宗教自由意志的印记,是黑格尔自由观的“改版”,是一种“精神至上”的自由。

然而,马克思(2002a)也批评了伊壁鸠鲁完全否定必然性、把自由和必然对立的消极一面。他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3], p. 201)这表明,马克思不仅主张通过自我意识通达精神自由,更强调通过自我意识来把握现实世界,追求“定在中的自由”,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此时,“自由何以实现”的现实问题已成为马克思的核心课题。但是,发现现实并不等于把握现实,此时马克思所追求的“定在中的自由”,仍是缺乏具体社会内容的抽象预设。而把握现实必须首先置身于社会现实之中。这些思考为我们考察《莱茵报》时期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社会现实的发现。¹

3. 社会现实与马克思自由观的转向

马克思坦言,《莱茵报》的工作为他展现了真实社会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把他的视线拉向了人类最本质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关系。这无疑为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转向提供了极具批判性的思想舞台。其中社会现实的发现、黑格尔自由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的矛盾,马克思开始质疑既有理论,并开始探索出一条与黑格尔本质不同的自由之路。

3.1. 自由的概念与现实冲突

自由何以实现?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即昭示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自由。19世纪40年代初的德国,正处于思想禁锢与变革要求的激烈冲突之中。面对普鲁士政府颁布新的书报检查令,许多自由主义者欢呼“新闻出版自由的曙光”即将到来。然而,马克思却敏锐地洞察到新法令的实质是“打着自由

¹学界依据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地上事情”“定在”等的表述,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开始关注现实,具有“现实性”的特点。诚然这种对“现实性”的理解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提升《博士论文》的同时,遮蔽了马克思思想历程中《莱茵报》时期的重要性。二是造成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些误判。不可否认,《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已表露出对现实的关照,但,不难发现,这时马克思对现实的关照,更多的是一种对既有理论的不满和理想情怀,对现实的理解也更多是一种“学院式”“旗帜式”的抽象理解。

的旗号反对自由”。

马克思(2002a)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书报检查制度是不自由的体现”，把新闻出版自由与书报检查制度置于自由的对立两端。他强调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3], pp. 166-179)，将自由的本质与人民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对诸侯、骑士等不同等级的代表进行了深刻批判，指认他们反对新闻出版自由，并非反对自由本身，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正如马克思(2002a)所说：“没有人反对自由，他们反对的只是别人的自由。”([3], p. 167)这一深刻洞见不仅戳穿了特权阶层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真实动机，也为他后来对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埋下了伏笔。

3.2. 物质利益问题的发现

物质利益问题在《莱茵报》时期首次进入马克思的视野，成为其思想变革的重大“事件”，更标志其方法论的根本转变。马克思(2002b)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忆说，他在《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5], p. 8)。所指涉的不仅是具体议题的困扰，更是其原有哲学在现实面前的失效。与鲍威尔、黑格尔适合全体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理念”不同，马克思直面既有理论中的物质因素“空场”“趋于尊重事实”(Berlin)，发现了这种理性自由观的弊端。物质利益问题正是马克思在深入考察并思考了一系列德国现实的具体政论事件的新发现。具体表现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认识到普遍自由丧失的背后是物质利益对人的支配的结果。

按照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法是国家理性的普遍表达，现实中的利益问题是作为国家理性自我扬弃的一个环节，国家和法应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然而，马克思(2002a)辩论中看到的却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的残酷现实：省议会将法律变成了“私人利益给法制定法律”的工具，物质利益公然凌驾于国家理性之上，法沦为“不法”([3], pp. 178-179)。理论和现实的巨大差别，使得物质利益问题开始从天国落入尘世，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发现不仅动摇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理论基础，更迫使马克思(2002b)意识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5], p. 8)

这一认识标志着马克思分析视角的根本性迁移。他不再从国家理念或普遍理性出发，而是第一次尝试从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来理解法律与国家的本质。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2002a)已经察觉到不同等级代表的态度差异背后是私人利益的对立([3], p. 186)；而在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2002a)更进一步认识到这种利益冲突本质上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3], p. 111)。当林木所有者为了确保自身利益而不惜“挖去人民身上的每一磅肉”时，马克思看到的不仅是道德的沦丧，更是经济关系对政治法律的本质性支配。因之，马克思呼吁国家必须在私人利益面前展现自己的理性本质，保证法的确定性，认为国家应当作为普遍利益和自由的维护者——“作为理性体现的国家必须在自私自利的物质利益面前庄严宣布：‘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4], p. 92)

这种方法论转向的革命性在于：马克思开始将分析的重点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哲学思辨，转向对“市民社会自身”的内在解剖。物质利益不再被视为理性自我扬弃的环节，而是成为理解社会现实的关键锁钥。这一转变不仅为他后来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更奠定了他终生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3.3. 马克思对自由现实性的双重规定

在普鲁士德国的特殊历史语境中，马克思面临着双重解放任务的政治哲学难题：既要完成市民阶级

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解放，又要推进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类解放。这两种解放本该是历时态的解放诉求，在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呈现出共时性的复杂特征。这一时代困境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三种自由形态的交织，即特权等级的等级自由、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形式自由以及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普遍自由。根据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可以发现，马克思对自由现实性的双重规定，即人类普遍自由对等级自由、形式自由的否定性规定以及实现人类普遍自由的肯定性规定。从而展开其独特的自由理论建构。

在自由现实性的否定性规定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特权等级所倡导的等级自由。这种自由观本质上是维护特定等级利益的工具，它排斥普遍自由。马克思指出，特权等级通过书报检查制度等手段，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以此来维护其特权。他强调，真正的法律应当是自由的实现，而书报检查法却是一种防范自由的压制措施，“是任性的警察手段”。在批判特权等级自由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形式自由的局限性。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过于狭隘，只是将其视为一种行业自由或新形式的特权，而忽视了其作为人民进行精神斗争的重要价值。

在自由现实性的肯定性规定中，马克思以自由报刊理论为载体，系统构建了普遍自由的实现路径。他(2002a)将自由报刊界定为“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和“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强调其作为“联结个人与国家和世界的有声纽带”的重要功能([3], p. 179)。这一理论建构具有三重突破：首先，马克思将自由的实现主体明确为人民，特别重视市民和农民代表在推动新闻出版自由过程中展现的主动性；其次，他提出自由报刊具有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的独特功能，实现了物质性解放与精神性解放的辩证统一；最后，他强调普遍自由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通过人民的现实斗争来推动。

马克思对自由现实性的双重规定展现了一种革命性的理论方法，他既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存自由形态，也不是抽象地建构自由乌托邦，而是通过对现实矛盾的深刻剖析，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揭示自由实现的可能路径。这种方法论突破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在理论层面，他批判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思辨性，将自由问题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考察。在实践层面，他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形式性，将自由实现与人民的物质解放紧密结合。这种双重规定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当时的自由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更奠定了马克思后来的理论的基础。

4.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4.1.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系

关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系，学界存在“停留论”与“断裂论”之争。“停留论”者将马克思此时思想整体定性为自由主义，如伯克(R.N. Berk)指认为“欧洲自由主义学说”，伯林(Isaiah Berlin)称其“代表欧洲自由主义者”，塞德曼(Steven Seidman)认为其“用唯心主义表达自由主义”。国内学者如寇东亮[6]、李健[7]、王力[8]亦持此论。这种观点被批评为对马克思思想的降格，忽视了其思想的复杂性与对普遍自由的追求。对此的质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拉宾(1981)、费尔多谢耶夫(1980)、陈先达(1983)等捍卫列宁的“断裂”论断；二是宋希仁[9]、宋朝龙与张玉杰[10]通过区分自由观与解构自由主义内核予以反驳；三是李艳与刘同舫提出“间接批判”论，认为马克思“暂时逗留”于古典自由主义并已展开“间接批判”，但“未从正面以及根本意义上驳倒和超越古典自由主义”[11]。

这种“暂时逗留”与“间接批判”的定位难以成立。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批判“等级自由”而主张人类“普遍自由”，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捍卫贫民“习惯权利”，揭露法律对无产阶级权利的剥夺。均表明了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基本观点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而非仅“逗留”或“间接”接触。李、刘二文将批判的直接性与彻底性相混淆，其解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突破。不仅容易忽视这一中间地带，同时也遮蔽掉了马克思批判性的建构维度。

4.2. 对自由的重新定义——从“精神至上”到“现实自由”

《莱茵报》时期的社会现实体验，使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唯心论基础展开了彻底的解构。他明确指出，自由并非仅是精神领域的一种抽象追求，而是深植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马克思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将自由仅理解为一种精神自由的狭隘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自由与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这一解构过程沿着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展开，不仅标志着马克思自由观的重大突破，而且为其后续的自由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一，马克思通过对书报检查令等具体政治实践的分析，揭示了古典自由主义“意志自由”概念的虚幻性。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他敏锐地发现，普鲁士政府所宣称的“自由”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许诺，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化的限制措施来“防范自由”。这种发现不仅是对具体政策的批判，更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将自由视为纯粹精神领域之事的根本性质疑。

其二，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遭遇了黑格尔“理性国家”理念与现实的尖锐冲突。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构想，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其应是普遍理性的体现，在于协调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然而，马克思看到的却是“利益占了法的上风”的残酷现实——国家机构成为了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发现彻底动摇了古典自由主义将国家视为自由保障者的理论前提。

其三，马克思通过对法律实践的分析，解构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形式法权”。当他看到法律如何成为“私人利益制定法”的工具时，便意识到形式上的法权平等无法掩盖实质上的社会不平等。这种认识促使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支撑形式法权的私有财产制度本身。

4.3. 自由的社会实现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初步表达了对现实自由的想法，认为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即自由必须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需要在把握世界的基础上对现象世界进行积极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马克思称之为“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然而，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哲学实践”还主要停留在理论批判的层面，缺乏具体的现实内涵。到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直面社会现实，对自由的探讨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抽象，转而聚焦于自由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这一关键问题。

其一，马克思将自由的根基从抽象的精神领域转移到具体的物质生活领域。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认识到物质利益和经济关系对自由的本质性制约。这一认识促使他提出：自由的实现必须以物质条件的变革为前提，真正的自由是“定在中的自由”，即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实际享有的自由。

其二，马克思确立了人民作为自由实现的历史主体。通过对不同社会等级在自由问题上的立场分析，他发现特权等级是自由的公然反对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自由的不彻底拥护者，唯有人民才是自由的真正实现者。这一认识促使他将自由问题与人民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其三，马克思提出了通过社会变革实现自由的具体路径。他主张，自由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立法或道德说教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改造社会物质条件的现实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报刊等社会机构应当成为“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承担起将物质斗争升华为自由意识的重要功能。

自由不应仅仅停留于思辨的层面，而应转化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状态。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完成的这一理论重构，不仅实现了从“精神至上”的自由观念向“现实自由”的根本转变，更确立了一种将自由实现与社会变革、人民解放紧密结合的自由观。这一理论创见为我们今天思考自由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5. 结语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虽然还未能彻底批判古典自由主义，但他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和批判已经

表现出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思与突破。他不再满足于抽象地谈论自由，而是将自由置于现实社会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了物质利益对自由实现的深刻影响。这一转变不仅为马克思后续的自由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因之，可以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自由观的现实转向，不仅是他个人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上便是“同样倾听”所得到的额外收获。

参考文献

- [1] Hegel, G.W.F.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 Kant, I. 实践理性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 Marx, K., Engels,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4] 黄建都. 重读马克思: 文本及其思想(第二卷): “苦恼的疑问”及其解决: 《莱茵报》——《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文献及思想再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5] Marx, K., Engels, 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6] 寇东亮. 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变革的五个节点[J]. 现代哲学, 2018(2): 9-16.
- [7] 李健.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两大转变”论再认识[J]. 高校理论战线, 2013(1): 18-23.
- [8] 王力.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深层探析[J]. 学术论坛, 2011, 34(3): 1-4.
- [9] 宋希仁.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0] 宋朝龙, 张玉杰. 马克思对形式自由和理性自由的超越——对《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再探讨[J]. 哲学动态, 2019(10): 21-26.
- [11] 李艳, 刘同舫.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J]. 哲学动态, 2022(8): 28-34.